

信用卡高速扩张:跑马圈地还是恶性循环?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近年来,我国信用卡扩张的速度惊人。据权威部门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07年的短短5年间,我国的信用卡发卡量从300万张发展到了9000多万张。虽然很多人的钱包里有多张信用卡,但常用的也就一两张,有的人甚至办了也不用。有人称,信用卡成“休眠卡”,是一种资源浪费。但银行方面认为,这是跑马圈地的过程,不能错失良机。

为了寻求商机,银行信用卡的扩张方式多样化,被动办卡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消费者还因此背负了办卡带来的各种隐形负担。法律界人士认为,虽然有关部门对银行的信用卡发卡有风险警示,但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并不明晰,因此引来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

发卡泛滥导致大量“休眠卡”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银行卡走进百姓的生活。联名卡、信用卡、借记卡等多种多样的银行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近年来,为了抢占市场,各家银行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扩大信用卡的发卡量。

杭州市民陈先生称:“2004年,我花了40元钱办了一张广发银行的信用卡,银行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非常吸引人。后来,同事说很多银行可以免费办信用卡了,而且只要每年刷六次卡,就可以免年费。而现在经常遇到银行里推销信用卡的人上门服务。”

为了提高信用卡发卡量,各发卡银行不惜动用“蚂蚁雄兵”,在各大城市的大卖场、百货

公司、游乐场、电影院等人潮聚集之处设置信用卡申办摊位。有的还利用情人节、七夕节、中秋节等推出情侣卡、珍藏卡等,或利用附赠马克杯、鲜花等噱头吸引消费者。

中信I卡、招商银行Hello Kitty粉丝信用卡、农业银行大学生卡、工商银行“猪”卡,针对奥运,各大银行又推出奥运卡。据粗略统计,杭州各银行发行的奥运银行卡不下10种,目前已有中行、建行、中信、光大、招商、民生等银行推出了奥运题材信用卡。

“单位里的每个同事都有几张信用卡。”杭州一家公司的白领宋先生说,去年他去工商银行申请房贷,正在填表盖章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就拿出一张信用卡的申办表,并说这是限量发卡,免费办理,也可以留作纪念。看着工作人员期待的眼神,他就办了卡。他说:“听说只要信用卡不开通,就不用交年费。现在每年都要办几张信用卡,但用得上的就一两张。”

自上世纪银行卡叩开中国国门之后,该业务便在国内市场上取得了飞速发展。据中国人民银行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中国信用卡发卡量为9026万张,较上年同期增长82%。中国银行发卡总量为15亿张,较上年同期增长32.6%。

由于重发轻管,大量银行卡一经发出便被搁置一旁成为“休眠卡”。据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透露,到今年6月底,浙江全省银行卡累计发卡数量为9000万张,其中仍然活动的银行卡数量不足2000万张。也就是说,近八成的银行卡处于“睡觉”的状态,而信用卡的“活卡”比例也可见一斑。杭城一位银行人士直言:“现在办信用卡等银行卡就像买菜一样。”发卡泛滥,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量“休眠卡”的产生。

“遇卡头痛”还有隐性负担

由于各大银行在特约商户打折、第一年免年费等各种优惠上下足了工夫,在一番热闹的比拼中,许多消费者禁不住诱惑,成为“卡奴”。不少消费者被诱人的赠品所吸引,但在办卡之后,有的是将其永久性“雪藏”,有的则是还没开卡就把卡消了。

在宁波一家化妆品公司当业务员的小姐说,她有10余张信用卡,有些是与银行的某项业务相关联的,比如还贷就必须用该银行的卡;有些是理财项目优惠的,若持有某银行的卡购买基金,有手续费可以打折等优惠。还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动的“休眠卡”,这些都是银行工作的亲友推销的“人情卡”,但碍于情面,所以在半推半就情况下申请了。

笔者在宁波一家公司的门上看到“谢绝推销信用卡”的字样。“之前办张信用卡非常神秘,现在已经让人头疼。”这家公司的员工说,现在推销信用卡的人非常多,什么银行都有,每到年中或是年底更是络绎不绝,所以只好写个条子婉拒推销人员。

大量的银行“休眠卡”不仅增加了持卡人的理财成本,也造成了银行部门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知情人透露,银行卡大量“休眠”是杭州银行共同面对的问题,“休眠卡”占比各家银行都相差不多。

银行业人士介绍,每一张银行卡的物理成本是两元多钱,从申请成功的那一刻起,银行卡账户已经产生,银行要为此付出数据处理、信息维护等成本,庞大的“休眠卡”带来的银行资源浪费相当惊人。

最近几年,各大银行针对银行卡的收费政策屡屡出台,在金融资源浪费的同时,大量闲置的银行卡更是增加了持卡人的隐性负担,而信用卡更甚。据悉,第一年开卡免年费后即使不用信用卡,在第二年后也要交年费。如果不按时交纳,将按复利收取利息。一旦拖欠年费,个人信用就会有不良记录,直接影响到以后的购房贷款和买车贷款的审批。对于这些,消费者似乎只能被动买单。

虽然如此,银行发放信用卡的速度还是有增无减。各种新奇概念和时尚主题的信用卡携各种优惠纷至沓来。业内人士表示,国内信用卡市场与国外不同,国外可以通过收取年费、交易费、手续费三种渠道来赚钱。而国内基本上免年费,交易手续费又很低,只能靠刷卡手续费盈利。因此只要有收入意识的银行,一定会下大力气争取客户的进入。

恶性循环短期内难以遏制

在采访中我发现,虽然银行要对休眠卡进行常规计息、结算,计算机系统中必须为其“留一席之地”,但客户也觉得十分委屈:银行开办信用卡似乎并不慎重,发卡也并不十分规范。如果银行只要一个发卡的数量,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杭州市民方女士说,她从没到银行办过任何的信用卡,但家里仍有光大银行、民生银行

行等各种信用卡,都是别人托过来的,不用本人去就帮忙办好了。但现在要想去销卡既怕被收年费又要耽误时间,所以只好让它们“睡”在家里。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严立芬说:“银行加大信用卡发卡力度,一是想占领市场,二是引导人们刷卡消费的观念,进而赚取手续费。因此,很多银行不惜亏本也要发卡。”她认为,信用卡销售是一种市场行为,从目前颁布的法律制度来看,银行信用卡销售秩序有一整套详细的规范。但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文件至今没有出台,而只对银行有一些提示经营风险的文件。

宁波银监局有关人士认为,在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背景下,信用卡“休眠卡”的发放也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但银行毕竟是一个企业,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国家规定银行必须要了解客户及其资信情况,但对信用卡发卡的“休眠卡”、“活卡”比例进行限制并不现实。但银行自身应该对本行信用卡的使用率和用户做好调查,以降低风险,减少资源浪费。

有关专家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用卡业务只能算是刚刚起步。中国人接受个人信贷消费始自贷款买房买车等这类非日常消费的应用。如果信用卡能够将消费者生活中经常出入并会产生支出的场所的服务整合进来,解决更多的生活问题,那么信用卡的使用频率和价值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某商业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乱发卡并不是针对一家银行而言的,而是多家发卡银行的共同行为。这种现象要通过环境以及顾客的逐渐成熟来解决,只有这两者一步步走向成熟,信用卡市场才能最终稳定下来。

对此,严立芬提醒消费者,在众多的信用卡中,消费者要有明确的选择,自己投票,选择适合自己的信用卡,该拒绝时就拒绝,而不要碍于情面成为“卡奴”。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花样繁多的信用卡

新闻时评

时政点击

由深圳市长做客电视台看官民互动

9月9日,深圳市长许宗衡做客当地电视台,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市民的热情几乎令热线电话和短信平台爆掉,仅短信就收到了5000多条。而面对市民的提问,许宗衡两次向市民致歉,并现场打电话给市建设局部署对布吉的黑煤气进行专项整治。

近年来,一些地方主官主动走出办公室,走入民间,与民众展开更广泛的接触和对话,以更民间化的语言和表达,阐述自己的执政理念。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更深入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民众与官员的交流互动明显增加。而民众显然非常欢迎这样的交流互动,并予以积极回应。这是当代政治官员在地方治理和个人形象树立方面的一个积极现象。

与许市长相似,上周,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分别于9月1日、3日、5日作出批示,委托甘肃省委办公厅3次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以“跟帖”的方式回复关注甘肃的网友。这也使他的网络人气指数急剧上升,留言板的留言量短期内出现大幅增长。

民众的期盼与积极介入互动渠道的地方主官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民众意在通过交流解决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主官意在通过交流让民众更真切地感受自己的施政理念,增进理解,从而在施政过程中得到更多普通民众的支持。在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中,地方主官的表态不像在人大会议上那么“格式化”,而是更有个性,更为通俗,更加直接。对民众而言,主官在这种场合,面对自己所作的表态,远比报纸上那些单调的数据可靠可信可亲。这种感觉上的差异,很多时候就能改变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根本态度。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官民之间的互动交流应当是经常性、多样化的。胡锦涛主席在网上与网民的互动,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官员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加强与民众的接触和交流。事实上,对官民双方而言,多一些互动交流都是受益颇多;特别是对官员来说,交流意味着支持者的增加,意味着自己施政理念的更广泛传播,意味着自己亲民形象的树立。毫无疑问,这种双赢格局的形成,既是民众的希望,也是现代政治的应有之义。而从双方的地位与话语权之不同,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官员的积极性。9日晚笔者专门收看了深圳卫视上许市长的节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他的一些不同看法,应当说,他在电视上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形象,是影响我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德凯

持卡骑车 蛮横权力下的低级思维

莫名其妙的低级思维年年有,就数今年为最多。报载,9月1日,南京市交管部门和教育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学生交通安全联系卡”制度的意见》正式实施。按照该文件,南京市全体初、高中学生将实行“骑车许可”制度,学生必须持学校发的“中学生交通安全联系卡”才能骑车上路,无卡不得骑车。

这算哪门子事。这是当地交管部门和教育局的自创招数,还是采取了拿来主义,从外地借鉴来的经验?甚或是与国际接轨,从某发达国家取的洋经?这些,统统没有交代。姑且认定是南京市交管部门和教育局联手搞的自选动作吧。

此种做法怎么推敲,也难以入其妙门。骑自行车上路还要经过批

准,是因为南京的初、高中学生与外地学生相比,骑车能力特差?如果不是经过特别的批准,他们就会将车直接骑到沟里去?从而为交通管理、校园管理带来麻烦?一个《意见》可不仅仅是个意见,它拿到学校,是项命令,是要不折不扣实施的。大令一行,有卡才能上路,无卡谁敢骑车?《意见》对无卡骑车的处罚相当严厉,不是教育一下了事,假如一个班级有20%以上学生有不携带联系卡行为的,就要取消班级评优资格。这种惩戒方式并不新鲜,不就是搞处罚连坐吗?

怎么看,这项《意见》都像有关部门乱用、滥用手中的职权,属于正事不作为、瞎事乱插手。这里面有一件事,很显微妙。就是按照该规定,南京的中学

生要想骑自行车上路,必须由家长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再把申请集中报送交管部门,然后由交管部门对学生进行书面和实地的评估考核,学生经考核合格后才能持卡上路。这考核是怎么个考法,是相关部门人员白尽义务,还是要收费?还有,那个骑车卡需要用钱买吗?如果都要收钱,那就不纯粹是干花哨事了。什么加强学生和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过是幌子。

至此,这一低级思维就可作出“合理”的解释了。权力的蛮横源自于利益的驱动,在利益的作用下,一些人什么样的低级思维都不会让人感到再令人惊讶。所以,只要是见钱眼开,一些人再不合理、不合法的低级思维在这世上出现都不足为怪。 今语



漫画:傍老子

深圳市大梧桐旅游有限公司在上周一宣布,将在未来8年,在梧桐山南麓的恩上平台恢复和建立老子文化园,该项目是集旅游、观光、文化、武术、养生、休闲、会议为一体的综合开发项目,总投资9亿元。有当地市民指出,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子与深圳有何关系。(9月10日《南方日报》) 当前,利用景点承载传统文化,

已成为传统文化热里一个突出现象。它造成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复活和火热,只是活在景点上,热在经济活动中,而继承和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并没有落实在教育层面上,热闹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具体措施的缺失。

传统文化,不仅要走进景点,更重要的是走进我们教育思想深处。唯有此,传统文化才能成为国人真正的精神食粮。 文/王攀 图/张兮兮

意淫传统文化的成本被越抬越高

深圳市某旅游公司拟在大梧桐山投资9亿元兴建老子文化生态园,以突出“天人合一,大道和谐”的主题,方案已得到当地政府领导的肯定和认可。

近年来,一些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一改其“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转而所谓传统文化爆发出澎湃难抑的崇拜冲动,甚至达到某种如痴如狂的“意淫”之境。如果这种情绪被物化为各式文化标志工程,我们便必须为其支付昂贵的“意淫成本”。一掷200亿元异地重建圆明园,花费300亿元兴建中华文化城,投资近7亿元打造丰都“鬼文化城”,

耗资9亿元建造深圳“老子文化生态园”这些计划说明某些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意淫”,已到了如醉如痴、如痴如狂的地步。

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名义兴建的文化标志工程,投资少则数百万元,多则逾百亿元,而其投资主体无非是两个,即公共财政和民营企业。毫无疑问,若政府利用公共财政投资,无论其最终的“产出”效益如何,都将由纳税人来替其买单。若由民营企业出面,其筹资渠道要么是海内外化缘,要么到银行四处告贷。任何一项工程项

目,有投入便必须考虑其产出效益,可是类似文化标志工程的效益(包括无形的社会效益),却往往是被“意淫”者无限夸大的了。对传统文化的“意淫成本”逐年增高,甚至到了只计投入不计产出的地步。韩国人在弘扬其传统文化并制造和出口了大量文化产品的同时,几乎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如今,某些国人也在弘扬所谓民族文化,但他们却总是怀着一种自满自大的“意淫”心态,走的只是不计产出的“大跃进”老路。这种“意淫成本”不该由民众来承担! 周士君

只有胡小燕们才能“代表”农民工吗

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因为在媒体上公布自己的手机号获赞誉,后来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却招致骂声一片。胡小燕回应质疑:“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广州日报》9月11日)

胡小燕终于不堪重负,尴尬地关掉手机,更换了新号码,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以一个人之“轻”,去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重”,自然无法承受。正如她所言,她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一天数千个电话严重干扰正常工作生活,这样属于人情之常,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要有舆论认为,胡小燕的遭遇,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权利代言人过于稀缺的现状,要进一步扩大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席位。从阶层权益保障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必须和值得期待的。胡小燕的手机被打爆,说明农民工的诉求欲望是多么强烈,作为人数最为众多而权利最没有保障的群体之一,农民工格外需要一个强大的代言系统。然而,回避不了的问题是,面对近2亿的农民工,农民工代表的数目从几个扩展到几十个乃至更多,其实也是杯水车薪。一个代表为数百万人“代言”,恐怕可操作性也不强,仍然还是会疲于奔命。

难道只有胡小燕们之农民工代表才能“代表”农民工吗?农民工的权利诉求,权益伸张,一定要靠特定的群体代言人的“鼓吹”才能实现吗?非也。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居功甚伟而所得却甚少——他们不仅是农民工,还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的艰辛与无助,每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论是官员、富人,还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都不应漠视,理应给予真诚而友善的帮助。还有,相应的权益保障制度和组织机构,也都理应保持通畅和广泛。这些,才是农民工表达话语权和实现权利欲望的主要途径。胡小燕们的“热情”,是制度渠道和群体性代言渠道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非农民工代表”要么对农民工问题毫不关注,要么关注和表达的视野流于表面,没有触及农民工权利的深层,解决不了真问题。而另一方面,制度性的诉求渠道又过于狭窄,甚至是形同虚设。这才导致了一个胡小燕成为千千万万人渴盼的“救世主”,一个曾经踌躇满志要为农民工群体权利“奋斗”的新阶层政治代表以“关机”而草草收场,这是怎样农民工权利背景下的一种“必然”。

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能走入参政议政的殿堂。但在现阶段,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困顿与渴望”,应该多体现在人大、政协的民生提案中,舆论和公权力的强力支持中,而不能只依靠几个所谓的农民工代表。 陈一舟